

抗戰日軍「一號作戰」與中共敵後發展策略

Operation ICHI-GO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CP

宋啓成 (Chi-Cheng Sung)

國防大學戰爭學院上校教官

摘 要

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原致力於赤化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此時雖致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表達效忠之意，然卻無心抗敵，反倒以發展自身實力為主，故不願與國軍戰力合而為一。自1940年，中共發動百團大戰，並引來日軍大力掃蕩且嚴重不利其發展後，反倒有機會自我整頓，加強其內部意識形態統一與對毛澤東的效忠，而成就另一種型式的實力發展。1944年5月，逐漸衰頹的日軍傾全力發動一號與烏號作戰，而頗有斬獲之際，共軍也因敵後威脅減輕，故能大肆發展，成為戰後叛亂的張本。

中共在這八年之所以發展神速，除得利於國府須傾全力對日作戰，加上治理弊端招致民怨，更重要是來自美、英盟國對中國大陸戰場的長期漠視，讓國府在國內戰場疲於奔命的同時，還要把大批精銳調往印緬，造成國軍節節敗退與主力集中西南，也讓中共能在廣大的敵後地區開闢根據地，導致戰後國內局勢混亂。

關鍵詞：一號作戰、中共、抗日戰爭、敵後

Abstract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roke out in 1937. Originall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devoted itself to take the whole China under its control, although it pledged loyalty to the R.O.C. government but paid no efforts to resi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developed its strength instead. Therefore, the CCP did not intend to be integrated with national armed forces. Since 1940, the CCP launched "Hundred Regiment Campaign", which incurred Japanese military's full-fledged attack and thus delayed its development. However, it found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self-consolidation and enhanced the unification of interior ideology and loyalty to Mao Zedong that achieved another type of capability development. In May, 1944, the much weakened Japanese forces gathered all its strength to launch Operation ICHI-GO and Imphal operations, which gained considerable combat success. The CCP forces could thus tremendously develop its strength due to the ease of threat in enemy-occupied areas.

The CCP could develop so fast is because not only the people complained about failed administration of the R.O.C. government, but most importantly, the neglect of the Chinese

theater by allies such as the U.S.A. and U.K.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Especially, while the R.O.C. was exhausted in fighting the Japanese in mainland, it still had to deploy a large number of elite troops to India and Myanmar to help the allied forces. Therefore, this shifted the major concentration of R.O.C. troops to Southwest China, and dramatically weakened its strength, which allowed CCP to establish in most enemy-occupied areas. China had thus been chaotic in the post Sino-Japanese War era.

Keywords: Operation ICHI-GO, 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Enemy-occupied areas

壹、前言

1944年4月18日，日本集結大軍，發動以打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奪取大陸西南空軍基地，及瓦解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抗戰意志為目的的「一號作戰」。¹在這場歷時超過半年，範圍涵蓋華中、華南與西南地區，投入其有史以來最大兵力的陸上作戰中，日軍很快就取得優勢，並打贏此戰役。

對這段史實，雖有不少作品曾探討過，然多聚焦在雙方交戰經過，對自願「共赴國難」的中共軍隊不是沒提，就是只占極小篇幅，也未與爆發較早，卻有所關連的「烏號作戰」一併觀察，²致無法了解全貌。特別是盟軍全力反攻歐洲與太平洋之際，國軍不得不在其強烈要求下，從國內抽調精銳增援印緬戰場，連帶削弱國內防禦力量，讓中共有機會在敵後大幅擴充實力，成為戰後叛亂的最有利張本。

由於中共自始堅稱其在抗戰中的主導地位，使無數英勇事蹟得不到應有表彰。為證明此說之錯誤，作者以中共官方對外公開文件，並結合整場戰事進行分析，期有助於釐清抗日戰爭真相。以下謹就一號作戰前中國戰場情勢、一號作戰的爆發與所暴露問題、中共的行動及對敵後戰場的影響等論述如后。

貳、日軍一號作戰前的中國戰場情勢

日軍自1938年10月占領武漢後即因兵力不足，無法繼續深入中國內陸，國府軍事委員會蔣中正委員長即採「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後方為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後方」的戰略，³將戰場區分正面與敵後。不過在盟國與中共影響下，這場戰爭卻變得極為複雜，對國軍作戰自然造成不利。以下分別論述一號作戰前，正面及敵後戰場概況，再論盟國因素的影響。

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8)——河南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6年6月），頁35、37。

2 「烏號作戰」即日軍為奪取印緬盟軍伊姆法爾(Imphal)基地，於1944年3月發動的一場戰役。參閱吉川事務官編，《伊姆法爾作戰（上卷）》（臺北：實踐學社，民國53年10月），頁126。

3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 作戰經過》（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9月），頁149。

一、正面戰場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12日，國府決定以優勢人力與廣大國土行持久消耗戰，一面消耗敵人，一面培養戰力，伺機反攻，並於8月20日成立五個戰區（如圖1所示）。⁴

斯時，因雙方戰力懸殊，日軍不久就占領包頭、大同、太原、開封、合肥、信陽、

杭州、蕪湖、岳陽之線以東的精華地帶，也扼殺中國財政收入與外援獲得。然直到日軍偷襲珍珠港前，國軍一直藉平漢、粵漢鐵路以西地形之利，固守最後抵抗線，持久消耗日軍戰力，⁵且歷經淞滬、太原、徐州、武漢、南昌、隨棗、桂南、棗宜、豫南、上高、晉南與第一、二次長沙會戰共13場重要會戰，總計投入582個師又32個旅的兵力，造



圖1 抗戰初期國軍戰區劃分圖

資料來源：作者以劉大年等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年8月），頁48所列之「盧溝橋事變前中國主要鐵路圖」為基礎，並依虞奇編著，《抗日戰爭簡史（上）》（臺北：黎明文化，民國69年8月），頁136-137所列資料標繪各戰區範圍。

4 虞奇編著，《抗日戰爭簡史（上）》（臺北：黎明文化，民國69年8月），頁135-136。

5 郝柏村口述，傅應川等筆記，《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5年6月），頁5、43、300。

成39萬以上日軍死傷，卻也付出近百萬官兵的死傷代價。⁶所以當日軍挾偷襲珍珠港餘威橫掃東南亞之際，竟無力擴大戰果，因為光投入中國大陸的日軍就有130萬人之多。⁷

二、敵後戰場

抗戰初期，雖有不少民眾自願和留置敵後的國軍部隊一同打游擊戰，然這些武裝團

體來源混雜且意向不一：⁸有服從國府，也有受命於中共，還有各行其事的。要整合他們，進而發揮統合戰力實非易事。

此外，原先通電「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⁹的中共中央，也先後將所屬紅軍改編為第8路軍（後改稱第18集團軍，編制如圖2所示）與新4軍，並納入第2、3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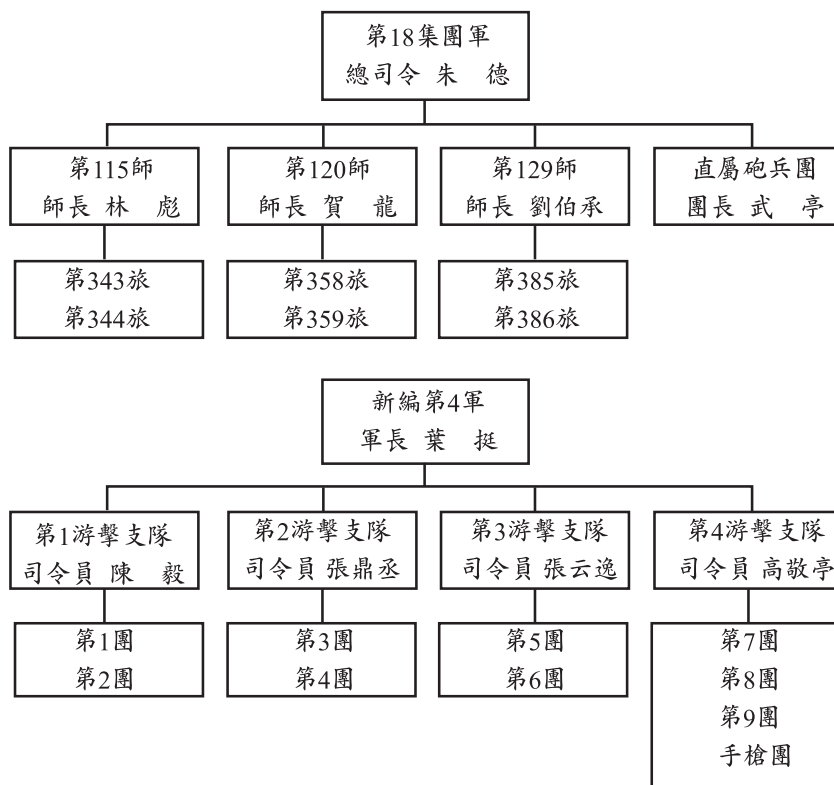


圖2 抗戰初期第18集團軍與新編第4軍組織體系圖

資料來源：1.郭華倫著，《中共史論（第三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等，民國71年10月），頁217-222。

2.《新四軍戰史》編輯室著，《新四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6月），頁19-22。

6 范英，〈國軍與抗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4年9月），頁36-38、17-32。

7 張玉法著，《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1998年6月），頁368。

8 這些游擊隊成員基本上有七種來源：(1)流散軍人；(2)各省府或專員公署的保安旅或保安團；(3)地方士紳；(4)失意軍人；(5)各縣保衛團與鄉鎮自衛隊；(6)綠林英雄；(7)留在敵後，或潛入敵後，或在敵後收編的正規軍。參閱傅應川，〈抗戰時期國軍「游擊戰配合正規戰」之戰略涵義〉，頁293。

9 毛澤東，〈為日軍進攻盧溝橋致蔣介石電，1937年7月8日〉收錄於《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頁1。

序列，名義上作為戰區戰略游擊支隊。

然這不表示中共已拋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誠心服從國府領導。事實上，早在中共中央於1937年8月22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洛川會議）時，就有人質疑「在聯合陣線中，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¹⁰ 結果卻變成以後者為主流，並決議在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強調的「政治領導」下，逐漸以發展中共實力為主軸。¹¹ 毛澤東之後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1)依情況使用兵力；(2)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3)自由決定是否接受南京所頒之戰略規定；(4)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¹² 就是會議結果的具體反映：要求以避實擊虛的方式發展實力，並結合「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人民參政」等口號，¹³ 擴大其在敵後的影響力。

在占領區中，日本採以華制華方式，

先後成立數個偽政權，附帶編成的軍隊（簡稱偽軍）雖與日軍併肩作戰，但得不到日軍信任，動輒干涉乃時有所聞。¹⁴ 此等狀況恰有利中共在敵後建立根據地與擴大組織，共軍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即便容易在日、偽軍難以兼顧的交通、通信線有所斬獲，卻構不成重大危害，自然影響不了全般戰略態勢。¹⁵

尤有甚者，中共也因而選擇性地挑選敵人：對偽軍等親日武裝，儘可能與之保持「善意的中立」。¹⁶ 但對有威脅之虞者，則是在分化後逐一打擊，最後迫其無法立足。¹⁷ 於是當共軍官兵人數達到一定規模後，中共就下令「擴大自己、征集給養、收編散兵…每師擴大三個團…」。¹⁸ 才兩年光景，原本9萬2千餘人的共軍，到1939年就擴充到32萬人。¹⁹

這些不僅無益抗戰，也威脅到敵後國軍

-
- 10 鄒讜(Tsou Tang)著，王寧、周先進譯，《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頁110。
 - 11 楊奎松著，《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6年3月），頁435。
 - 12 毛澤東，〈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基本原則的解釋，1937年9月12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頁44。
 - 13 毛澤東，〈在華北局勢危急情況下應堅持游擊戰爭方針，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頁66。
 - 14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六編 傀儡組織(三)》（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9月），頁1425-1433。
 - 15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廖運潘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1)一大戰前之華北「治安」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7年6月），頁163-165、911。
 - 16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發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和黨的工作問題給山東省委的指示，1938年1月15日〉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頁417-418。
 - 17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12月），頁323。
 - 18 中共中央，〈關於華北紅軍的任務與擴軍方法的指示，1937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頁390。
 - 19 萊曼·范斯萊克(Lyman P. Van Slyke)，〈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5年〉，《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711。

部隊安全，國府遂不得不對其進行封鎖，以防其殘害國軍戰力。²⁰遂造成國共兩黨關係緊張，特別是1941年1月的「新4軍事件」將雙方的衝突拉到最高點。²¹

此外，自1940年的百團大戰後，日軍開始大規模掃蕩中共根據地，雖暫時侷限了中共發展，卻也為其帶來整頓內部的良機。特別是1942年2月的「整風運動」，讓毛澤東成為中共一元化領導權威。日軍的掃蕩既讓共軍在藏匿物資與布設地雷等技巧因而提高，也更讓日軍難以捕捉，甚至能從偽軍身上得到七成的槍枝彈藥。

儘管如此，日軍直到1943年春，才認清「中共雖與國府有決不相容的本質，但將利用抗戰，巧妙地在日軍占領區內扶植及擴大其勢力，以建立與國府對立之完全另一種型態的半獨立政權」，並開始正視中共的存在與實力增長，之前則是將國軍列為第一打擊優先，之後才是共軍與駐華美空軍。²²然此時的敵後，特別是華北地區早就不是日軍所能控制的了。

三、國際因素的影響

戰前，蘇聯早就意識到德、日兩國的威脅，所以在1935年7月的共產國際(Comintern)第七次大會時，就決定以中國來拖住日本侵略，並以抗日為由，從中推動國府與中共和

解。

然對國府而言，無論日本或是蘇聯，都是威脅的來源：前者逐步蠶食中國，使之分裂成一個個仰賴日本的獨立政權；²³後者則是以赤化中國為本——這與中國所依伺的三民主義有本質上的不同。所以，國府提出「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就是要先求內部安定，強化綜合國力，再對抗外患。不過在各種親日與親蘇勢力的影響下，阻礙勢必難免，特別是作為國際共黨分支的中共，在蘇聯指引下，最後成功引導國府往抗日一而非安內攘外一的方向走去。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蘇聯一方面透過在日本的秘密佈建，²⁴一方面藉包括中共在內的一切反日團體，讓這場原本能儘快解決的事件變得無法收拾。翌年，武漢會戰結束後，大批日軍深陷中國大陸，蘇聯的戰略盤算終於成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雖加入反軸心國陣營，然受地緣因素與國府牽制大批日軍的事實，讓日本的威脅看似不像西半球那樣危急。所以當1941年12月22日美英兩國元首召開第一次華盛頓會議(The First Washington Conference)的第三天，美國就主動提出以確保英倫三島與大西洋海上交通安全為優先的「先歐後亞」戰略，將重點放在歐洲，²⁵中

20 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頁125。

21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四冊）》，頁238-239。

22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黃朝茂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2)——大戦期間華北「治安」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7年6月），頁63、65、73、723。

23 陶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冊）》，頁130-131。

24 事實上，日軍內部對盧溝橋事變究竟該不該擴大分成擴大派及不擴大派：前者以年輕將校為主，主張應即擴大對華戰事；後者以作戰部長石原莞爾為代表，主張應置重點在對蘇方面。由於共產國際潛伏日軍內部的德國人索爾格，利用近衛首相的機要秘書尾崎秀實及軍務局長武藤章，使不擴大派失勢，才會讓日本最後走向與中國全面開戰的境地。參閱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367。

國獨立抗戰四年，仍無法緩解對外援的渴望。²⁶

尤其在1942年4月日軍占領緬甸，切斷中國唯一對外陸路通道後，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決定反攻緬北及開闢中印公路。²⁷中國既然需要外援，就不得不將精銳部隊調往印度及雲南，形成另一種型態的兩面作戰與受援不均。結果就如前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陶涵(Jay Taylor)在彙整中美雙方資料後，作出從1942年5月到1944年6月，不含駐印與駐滇國軍，國府僅獲得60門砲、50挺反坦克步槍與3,000萬發子彈，而藉駝峰空運抵華的軍援則有98%送到駐華美軍及第14航空隊之手的結論。²⁸

參、日軍一號作戰爆發與雙方面臨問題

隨著太平洋盟軍逐漸攻向日本本土之際，日軍已無法確保本土與南洋間之海上補給線安全。眼看美軍已利用中國大陸機場直接空襲本土且大批日軍無法他調，日軍於是計畫在中國發起大規模攻勢，並擊毀盟軍在印度東北的基地。上述援助不均的現象，連

帶影響兩地的作戰與不利中國國內情勢、中國與盟國的關係。

一、日軍作戰計畫與戰況發展

(一)情勢研判與計畫擬定

1. 在一號作戰方面

日軍鑑於自1943年起，在東海的日船受損激增與臺灣遭盟軍空襲，所以在當年9月的御前會議確立「可因應英美之進攻的戰略態勢，並隨時捕捉摧毀敵之反攻戰力」方針，²⁹日本大本營決定採「摧毀駐華美空軍基地與大陸走廊打通作戰的構想」，計畫於次年4月，發動旨在「擊敗敵人、占據湘桂、粵漢及平漢鐵路南段沿線要地，以消滅敵空軍主要基地，封鎖其活動」的一號作戰。³⁰

本戰區分「平漢(『己』號)作戰」及「湘桂(『止』號)作戰」之兩階段：先投入4個師團、4個旅團及8個大隊，擊潰國軍第一戰區主力，占據並確保黃河以南之平漢鐵路南段沿線，再進行第二階段；結合抽自華北、武漢與廣州，共約12個師團、6個旅團及11個大隊兵力。於1944年6月發起攻擊，擊潰國軍第六及第九戰區主力後，占據桂林及柳州附近要域，並追擊湘桂與粵漢鐵路沿線國

25 “Meet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of Staff, December 24,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1941-1942, and Casablanca, 1943*,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8, pp.82-88.

26 例如1942年1-4月，美國運載軍火至中國的船隻，平均每月只3艘次，根本滿足不了中國需求。參閱齊錫生著，《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2012年3月），頁40。

27 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頁53-55。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著，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頁307。

28 陶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冊）》，頁303。

29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撰，吳玉貴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27)—「捷」號作戰指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6月），頁2。

30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8)—河南會戰》，頁51。

軍。³¹

2. 在烏號作戰方面

原先撤退到印度的英軍在1943年初反攻緬北，加上戰力逐漸提升的駐滇、駐印國軍，都嚴重威脅緬甸日軍。日軍遂將駐軍從一個軍四個師團，擴充到三個軍九個師團，並指向伊姆法爾，擊潰英印軍主力後，於阿拉干山脈(Arakan Mountain Range)建立防線，爾後即採持久態勢。³²

在這場需穿越300公里原始森林，包括海拔2,000公尺的阿拉干山在內的作戰中，日軍不僅無法動用重裝備，所攜糧秣也只夠2~3週食用。為達既定目標，日軍乃大力強調精神戰力的作用。例如第15軍軍長牟田口廉也(Mutaguchi Renya)即以「沒有食物也一定要戰鬥，沒有武器、子彈等不能成為避戰的好理由，沒有子彈的話，還有銃劍（即上了刺刀的步槍），沒了銃劍還有拳頭」，來反駁部屬的意見具申。³³

(二)作戰準備與戰況發展

日軍除延長官兵服役年限，以充實占領區兵力外；³⁴又在1944年2月，抽調後勤人

員，新編8個獨立步兵旅團以接替原駐防部隊。雖說這些後方警備與第一線部隊兵力相近（兩者在華北地區的步兵大隊數分別為70與67），戰力卻非常薄弱，除兵員素質與士氣低落、裝備短缺外，內部問題也相當多。面對共軍可能的各種危害，日軍加強與偽軍合作、改變過去事事干預的態度，還強烈要求所屬貫徹不殺、不姦、不燒的愛民方針。³⁵

3月8日，日軍發動烏號作戰。29日，日軍完成對伊姆法爾(Imphal)的封鎖，包圍6萬名英、印部隊及該地所有物資。盟軍研判日軍若繼續打到科希馬(Kohima)，將直接威脅駝峰空運的美軍基地，³⁶甚至會激化當地的阿薩姆邦(Assam)與印度分離風潮。³⁷於是強力要求國府抽調國內部隊增援，蔣中正最後不得不派出4萬精銳部隊至該方面。³⁸

4月18日，日軍從中牟渡過黃河向南進犯，一號作戰正式發動。³⁹國府與美國雖早已獲得情資並擬定對策。然一方面因上述兵力調動，能增援的國軍不足；另一方面則未對日軍機械化部隊預作防範，致難達預定效果。5月8日，日軍占領西平、打通平漢線，完成本

3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8)一河南會戰》，頁78-81。

32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黃朝茂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45)一伊洛瓦底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6年6月），頁8-9。

33 〈戦争日本兵たちは：インパール作戦〉，《京都新聞》，2015年7月19日，版15。

34 湯恩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報告豫境敵情電，1944年4月24日〉，收錄於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 作戰經過(二)》（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9月），頁626。

35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2)一大戰期間華北「治安」作戰》，頁679-684、692-696。

36 陶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冊）》，頁297-198。

37 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著，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頁447。

38 芮納·米德，《被遺忘的盟友》，頁497。

39 同註38，頁499。

戰第一階段目標。⁴⁰

5月26日，日軍兵分三路，於湘北發起攻勢，企圖貫通粵漢線，及奪取國府最大的米糧產地長沙。在一些因微薄酬勞，願充日軍前導的當地百姓協助下，⁴¹長沙於6月18日失守；另一個戰略要地衡陽也在死守6週後，於8月8日淪陷。⁴²

此後，日軍為奪取桂林與柳州的空軍基地，並接上與中南半島的陸上交通，旋於攻占衡陽後，集中約10餘萬兵力，兵分三路，繼續指向桂柳。11月22日，日軍亦達成此目標。⁴³此時，日軍已因久戰兵疲，無法再與陸續增援的國軍交戰，雙方遂又重回對峙態勢，⁴⁴歷時超過半年的一號作戰終於結束。

二、國軍與盟國於本戰所暴露的問題

日軍在本戰固然有用兵上的優點，然其致勝原因是多方面的，當中有來自國軍，也有盟國方面的問題。

(一)國軍暴露的問題

一號作戰前，國府治理區的種種弊端已相當嚴重，其中又以長期通貨膨脹為最，⁴⁵對國軍備戰亦帶來不利。所呈現的即如美軍第14航空隊指揮官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所述：⁴⁶

第九戰區的軍隊是在給養缺乏下多年對日本人作戰的軍隊的典型。士兵…營養不足的情況很壞，使到他們容易患瘧疾、黃疸症、壞血病、痢疾和霍亂…上戰場的時候，他們靠一小袋乾飯，橫放在肩膀上…

武器是土製步槍，因土製彈藥不好和槍膛用得太久而光滑了，它們時常走火，或打不響。他們有些外國製的機關槍、日本臼，和一些法國和俄國製的大砲，但彈藥不多…

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在長沙陷敵後，曾就國軍後勤與火力支援問題，呈報蔣委員長：國軍缺乏防毒面具，木柄手榴彈十之七、八無法發火；砲兵火力不足，不能有效支援過廣的正面；參戰各軍除第62軍戰力較完整外，餘皆不足二分之一。⁴⁷另據陳納德回憶，獨守衡陽的第10軍，在人數與裝備皆占優勢的日軍連番圍攻下，所憑藉的只有舊式的法製75公厘大砲及國造步槍而已。⁴⁸

這類現象必然衍生少數官兵違紀犯法，而波及軍民關係與本次作戰，如第一戰

40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 作戰經過(二)》，頁635-639。

41 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著，陳香梅譯，《我與中國》（臺北：華國出版社，民國41年3月），頁256。

42 同註40，頁653-656。

43 同註40，頁672-678。

44 蔣緯國總編著，《抗日禦侮（第八卷）》（臺北：黎明文化，民國67年10月），頁37。

45 易勞逸(Lloyd E. Eastman)，〈中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頁666。

46 同註41，頁230。

47 白崇禧，〈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向蔣委員長轉呈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報告長沙戰役經過電，1944年7月6日〉，〈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呈作戰意見電，1944年7月15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 作戰經過(二)》，頁646, 648。

48 同註41，頁263。

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的檢討報告：⁴⁹

此次會戰期間，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現象，即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軍隊，無論槍枝彈藥，在所必取…甚至圍擊我部隊，槍殺我官兵，亦時有所聞…同時，並將倉庫存糧搶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數日不得一餐者…各部隊於轉進時，所受民眾截擊之損失…重於作戰之損失…

從上述報告、回憶內容來看，國軍失利乃種種問題累加的結果。影響所及，還有盟國的對華事務處理。

(二)來自盟國的問題

與當時盟軍在各地的勝利相較，中國戰場所呈現的卻完全相反。加上早先對國府情勢的負面評斷，對烏號與一號作戰兩場幾乎同時爆發的戰事，自然會以其所知與自身利益為優先，讓國軍得不到滿足來應付一號作戰方面。即使陳納德緊急致函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強調戰況的嚴重，還是改變不了此等劣勢：⁵⁰

…由於日軍資源有限，此一集結顯係戰略目標，我個人相信，發動進攻，乃屬必然，而且勢必嚴重…第一階段將…占領平漢路全線…而抵銷長江運輸受第14航空隊轟炸之威脅…第二個攻勢…將為占取富庶之湖南省…一旦敵人攻取長沙，則敵可南進…此乃吾人空軍前進基

地之所在…

結果是：1944年7月，第九戰區戰況不利時，只得不到150架次的空中支援，⁵¹根本就無力採取如打擊日軍補給線之類的積極行動；而在史迪威受蔣中正大力施壓後才勉強對美陸軍部提出1,500噸的物資申請後，還是在最後被馬歇爾否決。原因是他堅信這項支援沒必要，因為駝峰空運已用掉盟軍大量的運輸機，使反攻歐洲大陸因而延遲。⁵²尤有甚者，即便高思大使早在一號作戰直前的3月23日回報「日軍正準備在河南蠢動」，也是毫無結果。盟軍顯然只專注日軍的烏號作戰，國軍既然滿足不了其需求，於是便把腦筋動到中共身上，認為是解決當前困境的唯一希望。對此，史迪威向馬歇爾報告：⁵³

…由於目前軍隊（國軍）已經元氣大傷，我認為要補救也只剩一線希望，這就是從山西發動反攻…共產黨也應當參與山西反攻…

以史迪威身為中國戰區參謀長與美軍駐華最高階代表人的高度來看，他應該知道中共在這場戰爭的所作所為。不過他對中共顯然認識不夠，因為從1943年12月20日到1944年9月6日，史氏待在中國戰區崗位上的時間總共才只4天。⁵⁴所以他不了解國府面臨兩面作戰的難處，也不了解只集中力量在印緬戰場，可能衍生的後遺，甚至想透過馬歇爾，由他接替蔣中正的中國戰區統帥身分：⁵⁵

49 蔣鼎文，〈蔣鼎文關於中原會戰潰敗原因之檢討報告，1944年6月〉，轉引自芮納·米德，《被遺忘的盟友》，頁502。

50 陳納德，〈陳納德將軍致羅斯福總統函，1944年4月19日〉，《蔣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戰時通訊》，頁214。

51 同註50，頁216。

52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頁468。

53 同註52，頁478。

54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頁403。

…我看只有一個機會可以挽救，此即從山西發動一次反攻，從洛陽進攻到鄭州和漢口…山西之進攻，共軍亦應參加…兩年以前，他們（中共）曾表示願意與我一同作戰。現在，他們也許會聽話…除此之外，要補救此一情勢，實無機會…委員長必須將統帥權賦予一指揮官以全權…至少，我們還可以希望，一項微弱而分散的努力…阻止日軍…

此外，史迪威還對其妻透露內心話：⁵⁶假如當前的危機嚴重到可以把蔣介石趕下臺，而又不至於把中國搞垮的話，那就真的值得了。

雖然日軍發動一號作戰主在打通大陸交通線，但當打在一個身陷兩面作戰且內部殘破的中華民國政府，既無法從外援補實戰力，亦無法自主調度本身資源，還得事事受盟國干預，所衍生的問題自然會更加複雜，無形中幫了日軍大忙，也讓中共成為此戰的受益者。

肆、中共敵後戰場的行動及影響

無獨有偶，中共於本戰，也和盟國一樣，從政治角度思考，自然也無助於整場戰事。以下分別論述中共如何因應日軍攻勢，得以從中發展，再論盟國方面的反應，最後再論析其後續影響。

一、中共的行動

日軍掃蕩敵後雖重創中共，但未構成致命傷害，反倒予其沉澱與重整良機。自1941年以來，中共雖以其外圍部隊官兵來填補損耗，故每年仍有約1萬人的微幅成長，但這些兵員素質普遍低下。即使1944年初，共軍兵力已達47萬人，仍無法放膽與日軍交戰。⁵⁷1944年春，第18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在一場會議中，即承認此等狀況：⁵⁸

我黨的力量還不夠強大，黨內還不夠統一，還不夠鞏固，因此還不能擔負比較目前更為巨大的責任。今後的問題就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這就是為著將來擔負巨大工作的第一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

不過當日軍即將完成一號作戰的第一階段平漢作戰時，中共看出日軍抽調重兵到主作戰後，後方必定空虛，中共中央於是對所屬的華中局與華北局下達較先前更積極的指示：⁵⁹

…敵人已大舉向河南進攻，目的在打通平漢線並控制隴海路潼關以東一段，估計敵人暫時不會退出，河南平漢路以東及河南大部地區已成敵後地區，國民黨湯恩伯等部業已大敗，潰散者頗多，河南秩序紊亂…河南地方黨員在目前情況

55 〈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將軍呈馬歇爾將軍電，1944年7月3日〉，《蔣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戰時通訊》，頁280。

56 The Stilwell Papers(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48), p. 244.轉引自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頁407。

57 萊曼·范斯萊克，〈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5年〉，頁810-811。

58 同註57，頁811-812。

59 中共中央，〈中央書記處關於敵進攻河南情況下的工作方針的指示，1944年5月11日〉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3月），頁231-232。

下應該起來參加與領導河南人民抗戰…現在河南黨的組織與中央已斷絕關係…北方局華中局冀魯豫分局應分擔發動與指導河南及皖北人民抗日游擊戰爭的任務。中央決定：在鄭州以西地區由北方局負責；平漢路以東之豫東地區由冀魯豫分局負責；豫南及皖北地區由華中局及豫鄂邊區黨委與淮北區黨委負責…

乍看之下，中共中央似乎準備與敵後百姓聯合，來扭轉戰局，但這是有條件且充滿政治算計的。如中共華中局對所屬各區黨委與各師的指示：⁶⁰

當此敵寇大舉進攻中原時，特別是與國民黨軍隊鄰近的地區，應主動向國民黨軍隊進行政治攻勢，提出值此中原大戰平漢線危急之際，只要國民黨軍隊能停止對我軍之軍事進攻與停止進行反共與反人民的宣傳，我們願意捐棄前嫌與國民黨軍隊協同對敵作戰…

對此，毛澤東在6月14日《解放日報》社論中還更進一步強調：⁶¹

中國正面戰場現在已處於極端嚴重的狀態，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及國民黨統治人士即刻進行嚴肅的自我批評，修改自己的政策，從今天起，與民更始，則事尚可為…

倘若國府如毛澤東所呼籲的去自我批評及修改政策，卻又得不到認同，或者是無法取得立竿見影效果，共軍是否就要一直按兵不動，眼睜睜地讓整個情勢惡化？事實上，早在日軍發動攻勢後不久，中共除在各地保留最少數的黨員外，其他人員紛紛避開日、偽軍鋒頭，到其他地方從事擴充實力與地下活動，華北地區的中共人員則多退到河北與西安方面。⁶² 7月28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呈報新4軍的行動及研判：⁶³

新四軍最近軍事計畫：(1)以六師七師全部，於已由句容西關經蕪湖過江，與二師配合進占巢湖；(2)以三師進占合肥；(3)以四師經宿南等縣，攻蒙城；(4)以蕭銅虞碭一帶部隊，南進永城渦陽至蒙城會合；(5)以運河支隊沿隴海路東進與東泰等地會合，占據界首漯河；(6)企圖占據津浦路東平漢路西地區等情…

7月30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汝明呈報豫鄂邊區最新發展：⁶⁴

豫鄂邊區…乘此次戰事發生，乃積極活動，以抗糧抗征打倒國民黨推翻國民政府為口號…目的即在消滅我挺進軍，摧毀我地方低層行政機構，建立其桐柏山根據地…

上述文電僅部分呈現中共如何因應日軍

60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華中局關於協同國民黨軍對日軍作戰的指示，1944年5月5日〉收錄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著，《新四軍文獻(4)》（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2月），頁13。

61 毛澤東，〈紀念聯合國日，保衛西安與西北，1944年6月14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頁725。

62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2)一大戰期間華北「治安」作戰》，頁690、697。

63 李宗仁，〈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呈報中共企圖占據津浦路東平漢路西地區電，1944年7月28日〉收錄於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 中共活動真相(二)》（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74年11月），頁162。

64 劉汝明，〈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汝明呈報中共利用豫鄂邊區境內之黃學會煽動會匪赤化民眾建立桐柏山根據地電，1944年7月30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 中共活動真相(二)》，頁181-182。

行動，在相對空虛的敵後地區開闢根據地。在進一步了解狀況後，中共中央又下達新的指示：⁶⁵

…此次向河南發展與以前發展華北和華中的情況均有不同，情況更複雜…我們應注意下列各點：

(一)我軍發展河南，要善於插入敵頑（分別指日軍及國軍）之間的空隙地區…

(二)發展新區一般規律是首先著重政治宣傳，爭取同情，建立武裝，擴大武裝，以自己的軍政力量掃除阻礙，使局面初定，即轉入組織和領導群眾鬥爭，以建立根據地，這個步驟不宜先後倒置…

(三)迅速發動群眾抗日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是我軍深入新區的重要任務。

(四)新區政權，我軍進入初期應委派自己的縣長區長，但要善於吸引當地進步人士和開明人士出來做事，作我之助手…國民黨舊官吏應吸收其進步分子來共同辦事，但不能輕易信任…

(五)我軍和新政權應注意容納和吸收當地專門技術人才和知識分子…舊式中小學應接收逐漸改造，使其自願接受我黨教育方針…

稍具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在戰況稍縱即逝的戰場，任何行動都要以戰勝敵人為優先。爭取民心、減租減息固然重要，但還是不該因而模糊主從。從下列中共中央有關非共黨抗日團體的工作指示來看，顯然還是以

反或不反中共為區別敵我的標準，通篇內容還是只圖發展：⁶⁶

第一，對已有不反我之地方自衛武裝應建立友善同情的外圍關係，長期幫助耐心爭取使其能自覺自願走我軍道路；第二，堅決反我之地方武裝及遭人民反對之土匪武裝，如爭取無效，則應堅決解決之。但對俘獲人員不問首從一律採取寬大政策，分別改編或資遣之；第三，還應放手，根據當地政治條件，去建立新的武裝，以擴大我軍的地方勢力…

即便是遠在廣東的東江縱隊，下達的指示還是一樣：⁶⁷

…凡敵向北侵占之區，只要其有久占意圖，即應由你處派出得力幹部或武裝小隊至該區與當地黨員取得聯繫，盡力發展抗敵武裝鬥爭…以便自己發展。同時敵向北行動，（珠江）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區亦有可能擴大我現有武裝，希望廣東我黨武裝能擴大一倍，並提高戰鬥力…國民黨軍隊所在地區，我地方黨員仍應堅守隱蔽待機之方針勿變…

從上列指示，可發現對內都和如何爭取民心、發展組織、改變與分化敵對者，並儘可能秘匿行動等有關，完全沒提到國府一如他們所願去改正錯誤、自我批評後，中共該如何調整現有作法，立刻加入國軍抗敵行列，而是清一色批評國府錯誤。中共顯然準備在本戰缺席，專心一意去擴大共軍及根據

65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發展河南敵後工作的指示，1944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頁289-292。

66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發展河南敵後工作的指示，1944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頁290。

67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東江縱隊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給林平的指示，1944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頁297。

地。

於是隨戰況發展，中共必將陸續取得成果。為利爾後發展，中共中央針對新4軍第4師，發給華中局指示：⁶⁸

四師西進部隊已獲得極大戰果，目前應以鞏固已占地區為主要任務，應即迅速建立與加強地方武裝…除派幹部外，並可由主力部隊抽出若干連編入地方部隊，使其擔負地方守備任務，以便主力能迅速進行新的任務…

6天後，又指示蘇浙豫皖地區之發展方向：⁶⁹

新四軍（除五師外）在最近的任務，是向南（蘇、浙）向西（豫東、皖北）發展…

不過這些指示未必完全可行，所以下達後不久，又發出補充指示。例如中共中央基於新4軍在這段時期同時沿兩條軸線迅速擴張根據地後，將出現兵力不足問題，遂提出與部署有關的新指示：⁷⁰

新四軍西進南下兩個任務中，應以南進發展蘇浙皖地區為主要任務，江北兵力

應儘可能抽調向南。在豫東皖北方面現有兵力大概已經夠用，無需再加兵力…各根據地機動兵團抽走以後，應由老的地方獨立團，提升若干為機動兵團，再由老的獨立團留一部分作底子，成立新的獨立團擔任地方守備…

當層級越高的指揮官下達命令或指示前，本來就要多方考量，還需有一定程度的融通性與縱深性，才適應得了狀況變化。⁷¹由於中共只圖發展，只能追隨敵軍，在敵兵力薄弱處謀取戰果，根本提不出明確的全程作戰構想，自然無法集中優勢兵力與敵決戰。顯然只能在遇到問題時，才急忙頒布命令修正。對自身發展尚且如此，與國軍並肩作戰之事就可能只停留在嘴中，而難以付諸實現。所以把一份蘇聯1944年12月的機密報告所謂「自盧溝橋事變爆發以來，在七年半的時間裡，第18集團軍僅103,186人陣亡，而新4軍也不過折損數千人而已」，⁷²扣掉1940年1月，周恩來發給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密電中「自1938年10月到1939年8月，國軍傷亡已超過百萬人，但共軍只占3萬餘人」⁷³的數

68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四師工作給華中局的指示，1944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頁384。

69 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向蘇浙豫皖發展給華中局的指示，194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頁386。

70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華中軍事部署的指示，1944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頁404。

71 所謂「融通性」與「縱深性」係前實踐學社副總教官本鄉健（在臺化名范健）用來區別大軍（通常指軍團以上之大部隊，但獨立作戰之軍或師，其性質亦與之近似）與小部隊（係用來與大軍一詞作對比，通常指團級以下的部隊）在擬訂計畫的不同。由於大軍到最基層的縱深性大，涵蓋層面廣，所以在預為進行將來之各種準備時，應考慮能否適應較長時期之狀況變化，故需保有充分的融通性；但小部隊與之相反，故計畫時只需概略預測較遠之未來的變化，並時時對眼前的狀況加以判斷，而行決心、處置，故縱深性小融通性也小。參閱范健先生講授錄，《大軍統帥之理論與例證（第一卷）》（臺北：實踐學社，民國54年5月），頁3-7。

72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下卷）》（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3月），頁399-400。

73 陶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冊）》，頁189。

字，可知1940-1944年近5年的時間，共軍只損失約70,000名官兵。這個數字也印證了接替史迪威職缺的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所言：「在中日戰爭期間，中共軍隊不曾參與過一次重大戰役」、「只有在他們可以突擊非常少數敵人時纔肯作戰」。⁷⁴ 即使有作戰，打的也是無法和國軍結合的戰事，所以共軍在抗戰期間雖然也有傷亡，卻遠低於國軍死傷人數。

二、盟國的反應

儘管國府緊急調兵增援印緬戰事，但史迪威根本不會滿足，因為還需要11萬5,000人才能滿編，而且這個數字還未包括每個月的5,000人損耗。⁷⁵ 眼見要求國府再次增派兵力不易，羅斯福總統的官員們便想到動用共軍。不過，他們顯然對國共問題認識不多，在無意聽信國府說辭的情形下，中共的一切似乎被刻意美化，也斷定國共雙方只要好好地談，定能化解對立，共軍就會心悅誠服和國軍共同抗日；這類觀點加上蘇聯最高領導人史達林為中共說項後，⁷⁶ 羅斯福很快便決定派副總統華萊士(Henry Wallace)訪華，推動國府與中共合作。

蔣中正雖反對美方之動用共軍建議，卻還是同意美國派遣軍事觀察組訪問延安。1944年7-8月，美國派出兩支觀察團進入延安，親身評估共軍實力，還研究援助中共

的最有效方式。⁷⁷

這些似乎早在中共的盤算中，為得到更有利中共的評估，中共中央特別對所屬作了下列指示：⁷⁸

…我們不應把他們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動，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後根據地的理由，為有對敵偵察和救護行動之需要，準此可爭取其逐漸擴張到對敵作戰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軍事合作的基礎，隨後文化合作，隨後政治與經濟合作就有可能實現…在外交工作本身，我們目前應注意的是：一切應爭取主動，切勿陷於被動，更不應有求必應…可由我主動的有計畫的加以布置，即使是我們的要求，我們也可使其自動的先向我們提出。例如軍火援助，國民黨天天向他們噪刮，要這樣那樣，我們則暫不提起，反而引起他們的尊敬，向我們先提…

在中共這般布局下，同樣問題重重的延安與中共根據地轉眼間都成了美軍觀察員的「中國樂土之城」，還對日軍俘虜自願協助共軍感到印象深刻，自然就相信中共牽制五分之四在華日軍的說法，⁷⁹ 也接受毛澤東「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的說辭。⁸⁰ 中共於是成了開明、進步「民主的中國」，

74 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著，程之行等譯，《魏德邁報告》（高雄：光復書局，民國48年2月），頁256。

75 同註52，頁462。

76 例如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在1944年6月10日與史達林會談時，史氏即批評蔣中正未動用共軍的錯誤，又說中共是「奶油共黨」，並非純正的共產主義者，都有助於美國對中共的評估。參閱〈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呈羅斯福總統電，1944年6月11日〉，《蔣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戰時通訊》，頁224。

77 同註52，頁485-486。

78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外交工作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頁314-317。

79 陶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冊）》，頁307。

國府則是貪污、無能、專制「封建的中國」。⁸¹殊不知這些早就在中共的盤算之中。⁸²

史迪威爭取指揮國軍與動用共軍之事最後雖在蔣中正力爭國格且正式致電羅斯福請求調回並另派適員接替而暫告落幕。然中美關係也因此而倍受影響，不僅更有利於中共，也成為戰後美國干預中國國內事務的開端。

三、後續影響

大環境既有利中共，中共中央於是在1944年終總結當年情勢，作出回顧與前瞻：⁸³

我黨軍隊又有發展，現已達65萬，明年可能達到100萬，民兵也有發展，明年可能達到300萬。

我黨及中國解放區在國際上的地位已提高，外交關係之門已打開了。

顯然在一號作戰爆發近8個月的時間中，國府與中共的力量對比，已從早先的國強共弱態勢，逐漸往不相上下轉變。此時，中共對抗戰還是持較保守態度，認為「可能還有數年之久結束」，⁸⁴所下的指導還是以「擴大解放區」、「整訓現有自衛軍、民兵、正

規軍與游擊隊」及「加強擁政愛民與擁軍優抗工作，進一步改善軍民關係」等為主。⁸⁵

然而當1945年8月9日，蘇軍開始攻擊中國東北的日軍後，日本即將投降的跡象已極明顯。這時，中共一反早先的保守態度，準備利用國軍主力集中西南，無法在日本投降後立刻接收失土的良機，大肆擴大地盤及接收日軍遺留裝備。中共中央遂發出指示：⁸⁶

應立即布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進行廣大的進攻，迅速擴大解放區，壯大我軍，並須準備於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占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游擊隊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實現時，我軍對日軍應令其在一定時間內實行投降繳械…對偽軍，則應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與改編，並指令防區駐紮…

朱德之後又以「中共延安總部」、「總司令部」名義，接連發出七道命令，對日軍全線出擊。⁸⁷這時，共軍的兵力已經超過91萬人（第18集團軍與新4軍在1945年4月分別為61萬4,000與29萬6,000人），與十個月

80 毛澤東，〈毛澤東和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談話，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頁719。

81 關中，〈戰時國共商談〉，收錄於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十輯 國共鬥爭》（臺北：聯經出版，民國71年6月），頁276。

82 例如在爭取日軍戰俘的合作上，中共係從日軍俘虜中培養一批日人幹部，隨後又在各地建立日本人自己的反戰組織開始，這不僅讓極少數日軍願意投效共軍，還能讓日軍戰俘作出感動美軍觀察人員的舉動，而為中共發揮不少加分效果。參閱〈總政關於敵軍工作的指示，1944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頁237。

83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敵軍工作的指示，1944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頁432。

84 同註84，頁433。

85 毛澤東，〈一九四五年的任務，1944年12月2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頁739-742。

86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蘇聯參戰後準被進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五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9月），頁215。

87 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臺北：漢京文化，民國77年2月），頁464。

前的1944年6月相較，當時總共才47萬4千餘人。⁸⁸ 中共利用敵後的空虛狀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兵力有了成倍的增長，變化之劇烈，乃早先各時期所未有。共軍此時的編組與根據地發展分別如圖3、4所示。

日本投降後兩天，朱德致美、英、蘇三國駐華大使照會，請其轉達本國政府，強調中共已在8年抗戰中奪回近百萬平方公里土地，解放一億以上人民，組織100萬以上正規軍及220餘萬民兵，並建立19個大塊解放區。共軍及原日軍占領區一切人民武裝已在延安總部指揮下，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及盟國律定的受降辦法接受被共軍包圍之日偽軍隊的投降，收繳其武器資材，並負責實行協同盟國在受降後之一切規定，且有權選出自己的代表參加將來處理日本的和平會議與聯合國會議。⁸⁹

由於美國對戰後的東亞地區就像其戰時的對華軍援一樣，自始就缺乏一套沒有明確規劃，並將其安全優先排在西歐與中東之後。⁹⁰ 中共於是在戰後只用了4年時間，就將國軍擊潰，席捲整個中國大陸，完成共產黨所謂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兩階段革命戰略。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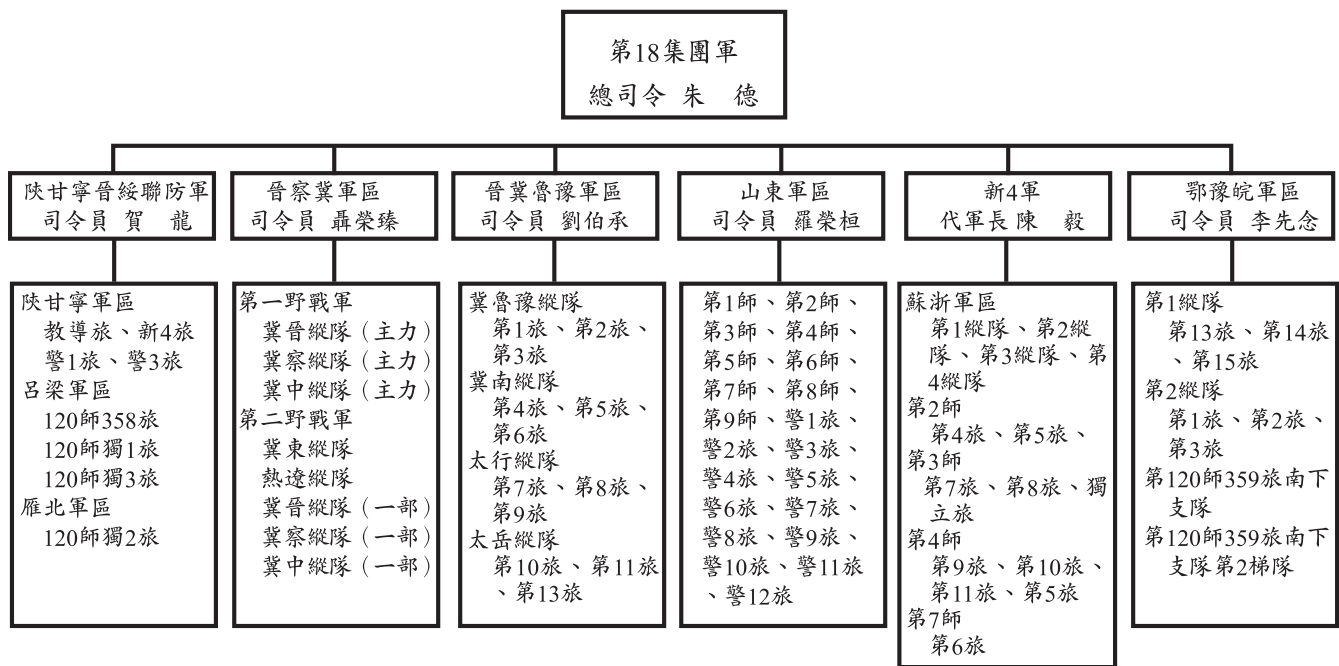


圖3 抗戰結束直前之共軍編制體系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略稿—第三卷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6月），頁812-817資料而成。

88 萊曼·范斯萊克，〈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5年〉，頁810。

89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頁467。

90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5.

91 陳志讓撰，楊品泉譯，〈1927年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收錄於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月），頁579。



圖4 1943至1945年日本投降之中日戰場形勢圖

資料來源：作者以劉大年等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年8月），頁253之「敵後抗日根據地恢復與擴大形勢圖」為基礎，調整標示線條顏色而成。

伍、結 語

中共8年來在敵後戰場的成功發展，為其累積打贏國府所需的根本一軍隊與影響力，這固然可歸因於中共的詐偽與國府施政失當。然而，美、英的短視與對中國情勢的一廂情願及自我感覺良好般地一再誤判，無寧加速惡化戰後的中國情勢。

於是當中共軍隊於韓國戰場與美軍交戰

後，曾經擁有良好形象，且一本有別於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共政權，一夕間遂成了美國人眼中的可怕敵人。連帶漠視曾共同參與過的對日抗戰，對國軍付出過的貢獻自然也丟到一旁。

近年來，西方世界的中國通們，又重新關心這段史實，也給國府較過去更高的評價。這種與過去有著180度轉變的修正史觀，先是陶涵(Jay Taylor)所著，於2009年出版的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中譯本名曰「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之後有英國學者芮納·米德(Rana Mitter)所著的《ForGotten Alley（中譯本名曰「被遺忘的盟邦」）》，兩者都給了國府應有的公正評價。⁹²

然細看這兩本書所引用的最新資料，除前幾年才公開的蔣中正日記外，其他具類似價值的一手史料均付之闕如。儘管蔣中正日記的史料價值如日本作家野嶋剛(Nojima Tsuyushi)所評「是亞洲近代史的貴重一級史料，且已被全世界所公認」。⁹³然嚴格說來，蔣氏日記只能視為以蔣中正個人觀點為核心的史料，無法完全取代其他史料。即便陶涵曾引用盛慕真(Michael M. Sheng)有關毛澤東在抗戰初期「要求共軍不要移動太快，每天移動50里（25公里），每3天休息1天」，強調其目的就是「儘可能保存實力，以利未來與國軍決戰」，⁹⁴藉以論述中共假抗戰真發展的企圖，但這段文字最早卻是出於大陸學者楊奎松發表於1988年的一篇文章。

換言之，這些學者專家著述時所引用，且足可否定中共傳統說法的證據早就攤在陽光下。不過，這似乎和它能否受到重視？寫出來的東西會不會被接受、會不會出現什麼迴響有關？大環境塑造出的氛圍殘酷地掩蓋住國府對盟軍戰勝軸心國的貢獻。因此作者以為，近年來西方世界從抗日戰史的著述中，重新給予國府與蔣中正正面評價，並

論證中共過往的說法為非，是否與當前各國普遍憂心中共發展，所型塑成的「中國威脅論」有關，藉重論這段歷史來隱喻中共的建國不正。倘若個人的看法正確，那這段歷史還是離不開政治的糾葛，還免不了被政客當成工具在用。希望這種無助於真相發掘的情形能早日結束。

（收件：104年8月4日，接受：104年10月8日）

92 傅建中，〈華府看天下一美國掀平反蔣介石風，2014年12月19日〉，《中時電子報》，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219000930-260109>（檢索日期：2014年12月19日）。

93 野嶋剛(Nojima Tsuyushi)著，《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蔣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東京：講談社，2014年4月），p. 26。

94 Michael M.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0-41.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新四軍戰史》編輯室，2006/6。《新四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中央檔案館，1991/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中央檔案館，1991/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五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中央檔案館，1992/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1995/2。《新四軍文獻(4)》。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毛磊、范小方主編，1996/10。《國共兩黨談判通史》。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 毛澤東，1993/1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 王健民，1988/2。《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臺北：漢京文化。
- 吉川事務官，1964/10。《伊姆法爾作戰（上卷）》。臺北：實踐學社。
- 姜克夫，1991/6。《民國軍事史略稿一第三卷下冊》。北京：中華書局。
- 秦孝儀主編，1981/9。《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 作戰經過(二)》。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 秦孝儀主編，1981/9。《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戰時期 第六編 傀儡組織(三)》。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 秦孝儀主編，1985/11。《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 中共活動真相(一)》。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 秦孝儀主編，1985/11。《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 中共活動真相(二)》。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 秦孝儀主編，1985/11。《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 中共活動真相(三)》。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 郝柏村口述，傅應川等筆記，2015/6。《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臺北：遠見天下文化。
- 張玉法，1998/6。《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
- 郭華倫，1982/10。《中共史論（第三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郭華倫，1982/10。《中共史論（第四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郭榮趙編，1978/4。《蔣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戰時通訊》。臺北：中國研究中心。
- 陳永發，1998/12。《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社。
- 楊奎松，1997/3。《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 虞奇，1980/8。《抗日戰爭簡史（上）》。
臺北：黎明文化。
- 賈廷詩等訪問紀錄，1989/6。《白崇禧先生
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 齊錫生，2012/3。《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
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
1945)》。臺北：聯經出版，2012年3
月。
- 劉大年，1995/8。《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
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 蔣緯國總編著，1978/10。《抗日禦侮（第八
卷）》。臺北：黎明文化。

專書譯著

- 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著，萬
里新譯，2007/9。《史迪威與美國在中
國的經驗，1911-1945》(Stil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北京：新星出版社。
-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撰，吳玉貴
譯，1989/6。《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
(27) — 「捷」號作戰指導》(大本營陸軍
部(9)昭和二十年一月まで)。臺北：國
防部史政編譯局。
-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
譯，1987/6。《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
(8) — 河南會戰》(一號作戰(1)河南の会
戦)。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黃朝茂
譯，1997/6。《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
(45) — 伊洛瓦底會戰》(イラワジ会戦 ビ
ルマ防衛の破綻)。臺北：國防部史政
編譯局。
-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黃朝茂譯，1988/6。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2) — 大戰期間
華北「治安」作戰》(北支の治安戦(2))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廖運潘譯，1988/6。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1) — 大戰前之
華北「治安」作戰》(北支の治安戦(1))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古屋奎二(Furuya Keiji)編著，中央日報譯，
1977/9。《蔣總統秘錄（第13冊）》(蔣
介石秘錄)。臺北：中央日報社。
- 芮納·米德(Rana Mitter)著，林添貴譯，
2014/6。《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臺北：天下文化。
- 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著，陳香梅譯，
1952/3。《我與中國》(Way of a Fighter:
The Memoirs of Claire Lee Chennault)。臺
北：華國出版社。
-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2000/10。
《蔣經國傳》(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臺北：時報文化。
-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2010/3。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臺北：時報
文化。
- 鄒譚(Tsou Tang)著，王寧、周先進譯，2012/1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著，程之行等譯，
1959/2。《魏德邁報告》(Wedemeyer
Reports!)。高雄：光復書局。

專書論文

易勞逸(Lloyd E. Eastman)撰，周祖義譯，1994/1。〈中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621-696。

范英，1985/9。〈國軍與抗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1-78。

陳志讓撰，楊品泉譯，〈1927年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收錄於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月），頁567-593。

萊曼·范斯萊克(Lyman P. Van Slyke)撰，汪朝光，李學通譯，1994/1。〈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5年〉，《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697-824。

關中，1982/6。〈戰時國共商談〉，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十輯 國共鬥爭》。臺北：聯經出版。頁243-307。

研討會論文

傅應川，1996/3。〈抗戰時期國軍「游擊戰配合正規戰」之戰略涵義〉，《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討論會抽印本）》。臺北：國史館。

網際網路

傅建中，2014/12/19。〈華府看天下一美國掀平反蔣介石風〉，《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20141219000930-260109>>。

外文部分

專書

Sheng, Michael M. 1997.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aller, Michael 1985.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野嶋剛(Nojima Tsuyushi), 2014/4. ラスト・バタリオン：蒋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東京：講談社。

官方文件

United States, 1968. *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1941-1942, and Casablanca, 1943*.

報紙

2015/7/19。〈戦争日本兵たちは：インパール作戦〉，《京都新聞》，版15。